



Working Paper No. 201917

November 23, 2019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Global Governance Panel 将持续追踪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定期收集整理全球治理研究领域权威成果推送分享

专题序言 在当前全球化进程受阻之际，区域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东亚地区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东亚区域的一体化进程。这个曾经被认为是低制度化的地区逐渐诞生了大量的多边双边制度。作为一个经历着比世界

*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系列成果 | 本期执笔：张尊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彭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上其它地区制度建立更多、重叠速度更快的动态区域，东亚地区俨然成为制度复杂性研究的沃土。本期重点关注**东亚区域的制度复杂性问题**，其中“制度过剩”、“国际制度竞争”、“制度制衡”、“制度复杂性”、“制度重叠”、“交叉多边主义”、“竞争性多边主义”等概念从不同视角对东亚制度复杂性的形成、影响以及变迁进行了解读。



冷战结束后一度被认为制度化不足的东亚因为种种因素经历了迅速的制度建设过程，导致了东亚制度在成员（membership）和职权范围（mandate）两个方面的大量重叠。Andrew I. Yeo 在文中使用了“制度重叠”这一概念。他认为虽然已有诸多针对东亚区域主义及东亚区域制度的研究，但针对区域制度的重叠性质以及这究竟对东亚意味着什么却鲜少涉及。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东亚区域制度重叠的决定因素以及其潜在影响上。

本文针对东亚地区构建了一个分析制度重叠的框架。为了说明制度重叠的过程，论文在围绕东盟的一系列区域制度中选择了东盟+3、东亚峰会以及中日韩三边合作秘书处作为案例。作者认为国内和跨国两层面上大量的现实性和规范性关

切（material and normative concerns）共同导致了现在东亚重叠的区域主义。其中现实性关切主要有成员国的功能需求以及偏好；地缘政治冲突和竞争以及谋求现有制度改革者与其成员讨价还价的失败。规范性关切则包括对区域未来愿景的落实和东亚制度特有的非正式形式和文化规范。另外，东盟在区域建设中谋求中心角色以及亚太和东亚区域主义观点间相互的竞争都使得东亚地区更易产生制度重叠。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作者认为东亚制度重叠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是积极的，它为小国提供了发声平台以及可以施加影响的工具，增强了中等力量在区域大国间的桥梁作用。最重要的是，对于东亚这个饱受历史问题、政治敏感性和利益冲突困扰的地区，重叠但类型层次多种多样的制度提供了多个有助于东亚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互动点，某种形式的建设性交流总比没有好。



美国退出 TPP 后由日本主导的 CPTPP 已率先完成谈判，在此压力下，东亚诸国积极推动 RCEP 尽早达成协议。SEUNGJOO LEE 认为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可以理解为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区域体制框架，而制度制衡是东亚国家转向大型自贸协定的

主要因素。换言之，相较于纯粹的经济利益，东亚国家建立大型自贸区更多是为了制衡目标国家对该地区架构的塑造。

制度制衡是大多数东亚国家倾向的一种软平衡类型。作者首先将制度制衡区分为制度间制衡和制度内制衡。当前，东盟十国分别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签订的“10+1”自贸协定之间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制度间制衡，TPP（CPTPP）与RCEP则是制度间制衡的最新例子。美国主导的TPP使得中日博弈转为了中美博弈，而中国崛起与美国在该地区的相对弱势为东亚地区的制度制衡提供了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动力。作者围绕RCEP和TPP两个大型自贸区的产生和发展，具体分析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在东亚合作大趋势下的竞争考虑及制衡行动。具体而言，中国采用了更有效的制度间制衡策略，而日本则试图同时进行制度内制衡和制度间制衡。

东亚国家利用大型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以及发展，参与了旨在建立新区域秩序的制度制衡博弈。东盟通过推动RCEP等促进区域一体化的自贸协定，调解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由此避开了长期存在的关于区域合作这一主要体制平台的不同意见。也表明了制度制衡行为不仅限于大国，也为东亚地区的中小国调解大国潜在的相互冲突的利益提供了途径。



李 巍

2011年第4期 第7-34页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 ——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

冷战结束后，尽管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在初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却始终无法深入发展并形成一个总体的区域制度框架。作者认为，形成上述情形的主要原因在于，众多地区机制相互制肘以及主要国家对经济一体化主导权进行争夺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制度泛滥。换言之，制度过剩是东亚经济整合困境的核心因素

制度过剩作为该篇文章的核心自变量，主要是指区域制度数量供给过多，超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需求。此外，数量众多的制度发展水平普遍较为低下，导致有效的治理难以实施。作者在简述近 20 年东亚地区三波制度建设浪潮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影响区域发展的四个主要行为体——美国、中国、东盟和日本——的不同偏好及其在区域内通过制度争夺主导权的动态过程，论证了其核心观点。他同时指出，日本和东盟在金融危机之后地位逐渐弱化，东亚的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制度过剩的概念，并用其解读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局限性，指出制度过剩导致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竞争加剧且阻碍一体化发展，使得东亚地区可能沦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碎片”。



王明国

2013年第1期 第4-32页

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

近年来东亚地区大量制度建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东亚制度复杂性以及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关注。国际制度复杂性作为国际理论的前沿问题，区别于制度过剩等概念，研究的重点在于分析国际制度互动对国际合作的影响。

具体来说，作者认为东亚地区国际制度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区域层面和次区域层面，且存在着平行制度（parallel institutions）、重叠制度（overlapping institutions）与嵌套制度（nesting institutions）三种主要类型。作者使用定性案例研究的方法，选取中日韩合作机制、东盟地区论坛、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可以充分涵盖上述制度类型的主要区域制度，分析了这些制度与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关系，并得出在不同情况下推进东亚一体化的可行途径。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对先前东亚“制度过剩”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制度复杂性作为当前东亚地区的一种客观事实，并不一定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相反，它有助于政策的“多速”协调，避免谈判陷入僵局，发挥了凝聚核心国家力量并为小国发声的作用，为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可行选择并注入了活力。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

任琳 熊爱宗 鲁桐 吴国鼎 陈兆源
韩永辉 宋锦 刘玮 沈陈 彭博

研究助理团队

兰馨彤 孙振民 张尊月 郭蔚霄

责任条款：本报告仅供内部讨论，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团队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有违反，我们保留追责权利。本报告仅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所在单位的观点。